

外国教育 **WJ** 理论译丛

公民品德与公共教育

***CIVIC VIRTUES
and PUBLIC
SCHOOLING***



[英] 帕特丽夏·怀特 著
朱红文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GONGMIN PINDE YU GONGGONG JIAOYU

公民品德与公共教育

[英]帕特丽夏·怀特 著

朱红文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北京·

本书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社授权出版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96-104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民品德与公共教育/(英)怀特(White, P.)著;朱红文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12

书名原文:Civil Virtues and Public Schooling

ISBN 7-5041-1851-6

I. 公… II. ①怀… ②朱… III. 公民教育;社会公德教育-英国 IV. D75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0102 号

责任编辑 李 玢

责任印制 尹明好

责任校对 徐 虹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太平庄·北三环中路 4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唐山市胶印厂印装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4.5 字数:113 千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3 000 册 定价:8.00 元

序 言

这是一本关于教师和学校在培养青年人成为好公民这一事业中能够,或者,应该起什么作用的书。不过,它不是一本公民学教科书。它并不研究政府或公民的权利和责任,而是探讨怎样成为和做一个文明的公民。它关注的是我们在其中生活着的日常世界,是普通人的某些品德和价值,对维护和发扬开放、多元社会中的民主精神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当教育学者试图理解和把握民主的真正含义时,他们经常引用杜威(Dewey)的著名论断,即“民主并不只是一种政府组织形式,而更是一种一起生活的方式”。不过,很少有人比较完整地引述包含这一权威论断的文字。我在这里作详细的摘录,因为它恰到好处地说明了帕特丽夏·怀特这本书的主题和内容。

民主政治对教育的热诚是一个熟知的事实。表面上的解释是,除非选举和服从统治者的那些人在受教育,否则,依靠公众投票而产生

的政府是不会成功的。既然民主社会杜绝了外部权威的来源,那么,它就必须要在自发的素质和兴趣中寻找一种替代物;而素质和兴趣只能由教育来创造。但是,还存在一种更深刻的解释。民主不只是一种政府组织形式;它主要是一种一起生活、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许多个人分享某种利益,这样,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拿自己的行为与其他人的行为比较,考虑他人的行为以确定自己行为的目标和方向,这许多个人在空间上的扩展,与打破妨碍人们充分理解他们自己活动的意义的阶级、种族壁垒和民族疆域是相同的。(Dewey, 1916 年/1963 年,第 87 页)

如果我们像杜威一样,把民主看作一种社会生活的形式,一种一起生活的方式,共同交流经验的场所,看作壁垒的打破,利益的共享,那么,来自许多不同团体、背景和具有不同才能的人相互作用的方式,有助于形成一个或多或少比较民主的社会。而这些相互作用的方式,是由一些从父母以及其他正式、非正式的教育中获得的虽然平常却具有本质意义的价值、品德和素质所支配的。在这本书中,帕特丽夏·怀特探索把人们维系在一起,讲究文明,讲究以一种民主的生活方式共同生活、相互影响的一些品德和素质。她探讨了希望、信任、勇敢、自尊、自爱、友谊、依赖、诚实和正派。

对民主社会的希望,建立在这样一种社会信念的基础之上,即,民主制度的开放和自由,将允许任何人成为他们有能力成就的无论什么样的人。对自己的能力以及民主制度的信任,有必要靠勇敢来开辟道路。勇敢,即使在要求一致或非反思的服从的境况下,也只能干正当的事。自尊,只有当我们同时尊重别人时才能获得。自尊,既是成功的动力,也是对成功的报偿。友谊,是把许多个人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必须建立在依赖的基础上。对民主制度的公正性和开放性的依赖,是依赖这一品德发挥作用

的根本前提。诚实,也必定是民主社会的组成部分,违背诚实是民主凋谢的信号。最后,正派是指我们如何相互对待,它直接证明和影响我们关于平等、宽容和其他民主价值的信念。

怀特对这些品德和素质的探讨,深刻而细致。她还以卓越的技巧和敏锐的感受性,探讨了这些理想价值的反面。她承认,要恰当地描述信仰和行为的这些无定形的方式,是一件非常复杂,也是很伤脑筋的事。而她使用文学的和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有助于她以巨大的想像力表达这些品德和素质的意义。她对伦理生活的描述很亲切,感受性极强,而不是通常由哲学家所描述的那种冷静、理性化和超然的理论类型。

她的论述,例子来自英美,来自日本和俄罗斯,也来自法兰西和斯坦的那维亚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因此可以说是一次环球漫游。但是,最主要的是,她帮助我们以非常深入而反思的方式,理解一个学校要成为民主的学校意味着什么,以及就我们对待学生、社会组织对学生的教育方式而言,需要赋予民主的品德以什么内涵。

这是一本充满温情、迷人而又有理论说服力的书。它将促进人们进一步考察服务于民主生活的其他品德和素质。无疑,它是当代教育思想中的一个进步,为学术工作的进步指明了新的重要方向。民主教育的概念被推广和丰富了。这样,我们永远不可能再退回到关于公民品德和公民教育的简单、狭隘的观点上了。

乔纳斯·F·索尔蒂斯

丛书编辑*

* 丛书名为“当代教育思想中的进步”,本书为该丛书的第17卷。——译者。

第一章 教育与民主的素质

公民的权利、义务以及如何培养适应民主社会的公民，一直是聚讼纷纭的问题，本书试图对这一论争的解决作出贡献。在政治哲学或教育哲学中，这不是什么新问题。公民的训练自柏拉图(Plato)以来，一直是讨论的中心；尤其是民主公民的品德问题，虽然其根源至少可回溯到卢梭(Rousseau)，自杜威(Dewey)以来，一直是现代教育哲学中的重要主题。但是，本书突出这一问题的新的意义，因为当今世界各国都试图建立民主制度——多党制、包含各种权利的新宪法、合法的贸易联盟——以取代以前的极权主义结构，在使用这些新制度的过程中教育它们的公民。

十多年以前，我写过一本书，认为民主是由诸如公正、自由、尊重个人的自主性等价值，而不是由定期的政府、自由选举、合法的反对派和自由贸易联盟等手段来区别的。后者，我在书中证明，就其自身而言并不重要，能够并且应该被其他的方法所取代，如果这些替代方法更好地体现了朴素的价值的話。我的想法不是说民主程序不重要，或者某种手段能轻

易地被别的手段所代替;这两种主张,我认为,都是错误的。我的主张毋宁是,民主不能像有时候人们所做的那样,与任何特定的程序完全等同,例如,等同于多数统治(majority rule)。在任何给定的情形之下,民主都应该通过把自由、公正、尊重个人的自主等价值最恰当地体现在那些场合来充分地加以实现。这一点在我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不过,在那本书中我没有认识到,存在着某种与建构敏锐地体现民主价值的制度一样重要的东西。制度必须由具有健全精神的公民来管理和使用。要适应民主制度下的生活,公民的确需要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见 P. White, 1973 年),但是,他们也需要培养怎样民主地使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他们需要民主的素质(Democratic dispositions)。

说某人具有某一特定的素质,这是什么意思呢?肯尼(Kenny)富有启发性地把素质看作:“能力与行动之间”(1992 年,第 84 页)。他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例如,当我们说某人勇敢时,并不意味着她具有一种与人类的其他能力相同的产生勇敢的天赋能力,也不意味着她任何时候都在干勇敢的事,具有勇敢素质的人,或者像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勇敢的人,能够抗拒有时趋向于自保的自然倾向而干他认为是正义的事。即使所有的习惯都是素质,素质也不能等同于习惯。

素质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人可以被培养成吝啬、慷慨、放肆、怯懦、勇敢、鲁莽、思维清晰、乐天派、自我歧视,等等。因此,从素质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灵和性格的特点属于什么样的类型,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以看出理智和道德上的优点和缺点。许许多多的素质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这里主要关心的是某些积极的素质或品德,即,一定会使兴盛的民主生活富有蓬勃生机的素质。贝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清楚地说明了这些素质在伦理生活中的地位:

所有伦理价值都建立在素质的基础之上。素质是基本的,因为道德生活的实际方式存在于素质预定的可能性中。素质本身就是伦理评价的对象,而且也是人们自身被认为是好还是坏的品德中的特征。……素质观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不过,它首先必须与素质符合一致。如果伦理生活要保护的话,那么,这些素质首先就要被保护。但是,与此相同,如果对我们的伦理生活要作有效的批判和改变的话,那么只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能够被理解为适当地改变我们所具有的素质。(1987年,第64页)

在这一研究中,我力图证明、陈述和衡量,这种观点对于某些赋予兴盛的民主生活以生机和活力的素质产生了什么样的实际教育结果。在研究过程中,我利用了论述素质和品德,尤其是探索个人品德的最新哲学著作,最重要的是安妮特·贝尔(Annette Baier)、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马撒·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阿米莉亚·罗蒂(Amelie Rorty)和贝纳德·威廉斯的著作。虽然这些著述都是很宽泛地论及伦理素质的性质和发展,本书把它们非常具体地应用于说明民主素质,即,公民所需要的素质,如果民主制度要发扬的话。不过,这些素质(在上述著述中)还没有紧密地与对民主价值的任何特殊的制度体现联系起来。如果公民具备了适当的民主素质,那么,不管什么特殊的民主制度,只要相称,政治中的事情就会变好。

读者可能感到奇怪,本书中几乎没有描述有关公正、宽容和个人自主这样一些民主素质。理由是,这些素质,放在一起,可以看作是民主的限定词,而且已经有一大批著作(例如,最著名的,Dworkin的著作,1977年,1985年;Rawls,1973年,1993年;Raz,1986年;Taylor,1985年,第2卷,第二部分;Walzer,1983年)试图改进我们对这些素质本身以及它们在民主背景中的应用的理

我的这一研究的焦点是,民主主义者需要的但不得不加以塑造的在民主社会中表现为某一特殊形式的其他素质。按照我的观点,这些素质是公民教育的本质因素,但是在我看来,在关于公民的不断增加的文献中,远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2章是从论述希望开始的。希望是所有社会都需要的。这里的论点不是说,希望,是民主政治,特别是如果是成熟的政治结构的话,可有可无甚至不可企及的天上的馅饼,而是说民主政治要求公民拥有某种独特的民主希望。关于社会信任(social confidence),我们采取相似的立场。公民需要感到对体现在他们社会中的价值,具有某种最好不经由自我意识而形成但却坚定的社会信任。这里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如何准确地把握和陈述民主的社会信任的特征之上。

第3章概述民主主义者所需要的那种勇敢。对于那些试图发展勇敢的人来说,这里的论述是有问题的。我的观点是,发展勇敢,不是教师或学生应该直接关注的事情,因为这可能是“伦理关心的错误方向”(B. Williams, 1995年,第11页)。相反,学校应该提供的是深思熟虑的、仔细设计的、内容广泛的公民教育,还应该注意勇敢行动之路的可能障碍。这才可能形成罗蒂(Rorty 1986年)所说的勇敢行为的必要条件——相信他们自己的能力的有能力的公民。

建立在关于勇敢的这一理解的基础之上,第4章展开关于民主的自尊(democratic self-respect)的分析,考察了民主的自尊与其他形式的自尊之间的紧张关系,然后又进一步考察了民主的自尊与自爱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多元文化的民主社会中,个别学生以及不同的学生群体所感受到的指向自我的感情,其形式是错综复杂的,学校在这一复杂的领域,到底起什么作用?本章在具体制度的范围内对此进行了探索。

友谊,第5章的主题,乍看起来,与一项关于民主素质的研究

是极不相称的。因为这里有待讨论的问题不是社会团结、友爱或公民友谊(这可能是叙述第8章主题的方式),而是具有通常被视为友谊的善意和善行特点的亲密朋友之间的关系。它在一项关于民主素质的研究中有着核心的地位,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看作是对民主社会的检验。因为惟有民主社会才能真正赞美友谊,它能允许友谊的价值偶尔胜过公民的价值。福斯特(Forster)1965年,第81页)的所谓出卖祖国与出卖朋友的选择,惟有在民主社会才是一个公众可以接受的选择。

第6章探讨有联系的依赖问题。从个人和社会两方面探索信赖,对于理解任何人类社会中人人与可能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根本联系都是必要的。不过,在民主政治中,局面因为对不信赖的审慎的使用而复杂化,而对不信赖的使用已作为保护性的措施植入各种制度之中。在这一领域,学校有多重任务,必须按照事物的本性,处理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它需要维持、有时还需要创造学生之间的信赖,以及对作为一种社会事业机构的学校自身的信赖。作为学校公民教育的一部分,教师必须鼓励学生理解和信赖广泛的社会政治制度,同时又不得不讲授不信赖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微妙而又必要的驾驭紧张关系的任务。

关于诚实,对于教师来说,事情也不会变得容易到哪去,这些是我们要在第7章中讨论的。诚实总是最好的策略这一点并不是确凿无疑的,因此,学生需要学会判断什么时候说出全部真相,什么时候少说点真相,也许,什么时候要保持沉默。社会机构也能或多或少更容易地使它们的成员在交往中保持诚实。所以,学校要按自己的要求认识到,在多大程度上它可能不知不觉地向它的成员施加了过份的压力,以致使得他们不再诚实。

对于论正派的第8章来说,合适的章前引语,可能是E.M. 福斯特在二战期间的1941年所作的关于战后世界可能需要的品质的评论:

最需要的是否定性的品德：不要傲慢，不要过分敏感，不要太急躁，不要满怀仇恨。我丧失了对积极的好战理想的全部信心：没有千百万人变成残废或被监禁，它们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我要清洗这个国家”，“我要清洗这座城市”的话，使我恐怖，使我呕心。（Forster, 1976 年，第 61 页）

在关于正派的讨论中，我们强调许多福斯特所谓“否定性的品德”——不要过份坚持某人的权利，不要走得太过，一般不要对非知己持一种友善的态度。跟在 1945 年一样，这些也是新的太平盛世所需要的品质。

现在让我对贯穿公民教育的五条线索，作些一般的说明。

首先，主要的焦点在于，以民主的形式促进勇敢、诚实、自尊等素质；也就是说，焦点在于把小孩训练成某类人。正如上面的要点所表明，这是小孩进入正式的教育机构以前，父母已开始很久了的一个微妙的过程。但是，从初级学校开始，独特的民主素质的改善和发展，也是教师和教育机构在与家庭合作的前提下应该承担的任务。正如这一研究以文字和现实的例子所说明的，并没有现成的公式。教师必须敏锐地感受不同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紧张关系使得我们不能作出简单的决策，这就要求我们训练怎样做出仔细的判断。所以，从某个方面看，这可以说是一部赞美教师的艺术的书，教师是反思性的实践家，不管加以多么生动的描绘，都远远不能反映教师在促进和培育学生素质的实际过程中的精妙的、优雅的艺术。

不过，贯穿在这些章节中的第二条线索表明，形成素质的完整图画，并不是凭关于个别教师鼓励、敦促和指导学生以某种方式举手投足的想象就可以捕捉到的。教师并不是像流行的神话中的孤

立的奇普斯先生 (Mc. Chips) 和琼·布罗迪小姐 (Miss Jean Brodie)^① 那样工作的。教师是某一机构中的教育团体的组成部分。在往后的论述中,作为形成素质的巨大力量而出现的,是由学校所组成的机构。社会制度或社会机构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或好或坏地塑造着在这些制度或机构中工作着的人们的愿望、习惯和素质,这是一种社会学的常识。往后的章节中,所有讨论强调的教育的要领是,学校要关心其组织或制度所给予学生的信息。一方面,包括对某些学生来说不愉快的、稀奇古怪的信息:“这一机构不相信、不尊重你,等等。”另一方面,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说,社会机构需要关心如何作出积极的、共同的努力,来发扬促进民主素质。

注意力到目前为止一直停留在如何把学生塑造成为公民这一广泛的方面,而没有让第三条线索呈现出来。这第三条线索,简单地说,就是学校并不关心同质的学生群体。学校的学生群体是由来自不同的宗教、种族和文化背景的男女同学构成的。接下来的讨论更多地注意这些区别,以及教师作为个人和作为一个教育共同体,在帮助这些非常不同的学生找到自己在民主的政治组织中的位置和声音这一问题上,到底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因为学生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技能和自我感觉,所以,如果试图培养和教育学生成为民主主义者的话,那么就需要对学生的宗教、种族和文化上的继承性有敏锐的注意。

讨论到目前为止可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民主主义者的形成,尽管起于意向,从根本上来说却是可以控制和操纵的。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和素质的促进一样,教师和学校关心的是如何随着学生的不断成熟,增加学生对民主政治的理解。这是第四条线索。目标是为学生作些描绘,不同素质的特点是什么,这些素质在伦理

^① 是出现在许多英文小说中的两个具有超凡本领的教师形象。作者在给译者的信中建议把这句话直接改译为:“教师并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人而工作的。”——译者。

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它们之间存在哪些紧张关系,随着时间的变迁,这些素质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为什么有些人或有些群体的人会喜欢以某些与别人不同的方式思考和做事。这显然是相当大的一批任务,这些任务不是在一个班级、甚至一批班级中就可以完成的。不过,随着时间的变化,基本的趋向将是,学生对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素质的理解不断进步,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别的地方学到的,这将使他们摆脱对某些思考和行为方式的轻率而僵化的依赖。(这些内容主要出现在关于自尊和自爱的讨论中。)

发展民主素质所要依赖的知识、洞见和技能的范围相当广泛,哲学的洞见只是其中的内容之一。贯穿这一解释的第五条线索认为,它们是不可替换的。在印度菜中外国产的香料所占的比例与其他成份相比相当小,但是,靠增加更多的菜花或更多的肉来取代香料,却不能达到相同的效果。教育哲学在师范教育中所占的位置同样如此。它只是整体中的一种成份,但却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当然,没必要一开始就完全投入到哲学的研究中,而应该选择合适的时间。对民主素质的研究,通常不会出现在初级师范教育中而会出现在在职教育中。当教师已获得了大量关于学校、学生、家庭与学校的关系的知识时,哲学的眼光就能解决他们所面临的任务,这是以其他任何方式都不可能完成的。

接下来的章节,尽管论题与论题之间依次演进是很明显的,但是,却不必按照它们所出现的顺序来阅读。可以把它们按照各自独立的章节来读,如果以这种方式来使用,章节之间相互参照,还可以收到相得益彰之效。

最后,也许还有必要说明,我们的讨论涉及的都是我们日常所看到的那些学校中的学生,并非只把理想的学校中的理想学生作为研究的对象。学生的家长和教师总是在谈论这些孩子变得更更有责任感了或更不负责了,更体贴他人的心情了或更自私了,对学习更专心了,等等。正如家长和教师评价的那样,所有的年轻人都在

不断地习得和发展素质。这里的讨论想支持和维护教师作为个人和作为学校这一共同体的一部分,努力促进学生的积极品质和帮助学生克服消极品质那样一种职业角色。后面的章节的论题经常都是依据简短的文学故事和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的,但是,我抵抗罗列教育实践中的繁杂、冗长的事例的诱惑。因为这些事例总是属于特殊的情境,通常需要作许多的限定才能消除它们本身带有的解释性目的。不过,这是我的经验,教师随时都会把自己的职业眼光带进像我们这里的讨论中,补充从他们自己的实践中得来的例子,用这些例子帮助自己提高对论题的理解,并进一步反思,在他们自己的实践中,这些论题可能有什么样的进展。这确实也不足为怪。毕竟教师的许多时间都花在怎样应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去解决伦理和公民教育中的困难问题上。

第二章 希望与信任

根据 G.K. 切斯特顿(Chesterton)的一个经常被引用的说法,“希望是在我们知道已是穷途末路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乐观的一种能力”(1919 年,第 159 页)。但是,在生活和教育中,希望也许还有更根本的地位。一位当代哲学家,玛丽·沃诺克(Mary Warnock),在写到情感教育时说:我喜欢在我的孩子和学生身上看到的所有品质中,希望这一品质,在我的清单中,居于很高,甚至最高的位置。丧失希望,就是丧失需要和想往任何东西的能力;实际上,就是丧失生存的希望(1986 年,第 182 页)。

最近 10 年内,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国家正在走向有利于权力的组织和控制的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自由贸易体系、自由选举和多党制已经成为现实,而警察国家管制制度则被摧毁。因此,民主程序已经或正在被确立。但是,民主单靠程序是存在不下去的。与程序或方法同样重要的,还有作为民主程序之基础的价值观念,以及实施民主程序和依靠民主程序才能生存的公民的感情和素质。正如我将力图表明的,民主的公民,需要具有,例如,自尊、自

爱、勇敢这样的素质或价值观念。希望,也是民主主义者所需要的东西吗?它甚至可能是“教育的首要目标”(Warnock, 1986 年,第 183 页)。社会信任也许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社会希望

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我们都有自己的希望——在竞争中取胜,暑假期间读完理查逊(Richardson)的《克拉丽莎》(Clarissa)^①,得到一份更满意的工作。我们希望对象,是我们有可能达到、但前进之路上有障碍的事物的某种理想的未来状态。不过,也存在着与整个社会的未来相关,在形成社会成员的经验中起着关键作用共同希望,这可以称为“社会希望”(social hopes)。民主主义者需要这种社会希望吗?

可以在基督教等思想中找到社会希望。的确,对社会希望这一概念的最近、最详细的哲学探讨,出现在基督教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的著述中,厄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②的 3 卷本著作中对此也作了许多论述。体现在 G. 马塞尔和 E. 布洛赫的著作中的社会希望,共有我们个人的和日常的希望的特征,因为它们也与理想的未来状态相关,在实现过程中也有困难,但是,除此之外,它们还要用一种更进一步的特征来说明。在 G. 马塞尔和 E. 布洛赫的思想中,希望对象都是不可避免的。G. 马塞尔和 E. 布洛赫所说的希望,指向的不是一种仅有逻辑可能性的未来,而是一种被决定了的未来。但是,既然希望对象是必然的,那么,为什么希望比确信的期待更合适呢?对于基督

① 18 世纪英国作家 S. 理查逊所著书信体小说,又名《一个青年妇女的故事》。——译者。

② 德国当代哲学家,主要著作是《希望的原理》。——译者